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胡适新论

耿云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胡适新论

耿云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适新论/耿云志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650-1

- I. ①胡…
- II. ①耿…
- III. ①胡适 (1891—1962) -人物研究
-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8797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胡适新论
耿云志 著
Hu Shi Xin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6.2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51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重新发现胡适

(代序)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其国际声望亦最隆。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规模与影响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代大师遭到全盘否定。从此，他的名字除了作为批判的对象，几乎不再被人提起。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年青人几乎都不知道胡适是何人。稍年长的人所知道的胡适，则是得自过去大批判的文字所构建的形象。

1979年，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付诸实施，带动起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还胡适以本来的面目，成为思想界、学术界颇为关注的课题。那一年的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会上有多篇研究胡适的论文提出，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被充分肯定。这是在1949年以后的整整30年里第一次恢复了胡适应有的一项名誉。

以这次学术讨论会为开端，重新认识胡适成为学术界、知识界一个明显的趋向。从那时以来，每年都有十几篇，乃至数十篇研究或讨论胡适的文章在全国各地发表。从1985年起，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两种研究胡适的专著出版，单是胡适的传记与年谱，迄今已有七八种之多。而这些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远非一般历史著作可比，它们往往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有关胡适的著作，在青年知识界尤具有吸引力。有不少青年学者选择有关胡适的题目作他们的学位论文。

有关胡适的书今天如此受人欢迎，受人关注，胡适研究今天如此热门，许多青年对这位前代人物表现出这样大的兴趣，我想最主要的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道义方面的。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始终保持了一种



要求公正的道义精神。大家都知道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过去对胡适的批判是过分的，是不公正的。把胡适说得一无是处，能够想象得出的罪名差不多都堆到胡适的头上了。从那以后，数十年间无人敢提出任何异议，他的朋友、他的学生都无法为他作任何辩护。只有当这种“大批判”的狂热，把国家民族推向悬崖的边缘的时候，人们才猛醒过来，才开始平心静气地思考问题。数十年里造成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对胡适的全盘否定自然也可算是其中之一。当青年学子们重新走进书斋，走进图书馆、档案室，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胡适——同 30 年来由大批判塑造出来的胡适形象完全不同的胡适。他并不崇洋媚外，更不曾卖国；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有一颗爱国家、爱民族的心，只不过他比常人多一些理智。他并不曾毒害青年，他只不过希望青年人多学一些知识，多长一些经验，多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充其量只能说，他的一些思想言论，在那个充满动荡和革命的年代，有一点不合时宜罢了。自然，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暴力革命。在这些方面，人们尽可以批判他。但对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对手进行批判是一回事，进行口诛笔伐、把人搞臭、打入十八层地狱则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去那样对待胡适，是很不公正的。古语云，不平则鸣。既然过去做得不公正、不公平，现在人们希望和要求恢复公正，就是很自然的了。所以，对胡适研究，现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子们普遍发生兴趣，普遍地希望了解一个真胡适，实有其必然性。

第二方面的原因，则是一种客观的需求，一种时代的回应。胡适有些思想和主张，当年颇有不合时宜的地方。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是战争、动荡、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是很容易使人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年代。现在，全体人民希望安定，热望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改革和建设。第一是要改革，第二是要建设。不改革，国家不能进步，不能发展；不建设，无以图富强，无以图幸福。但改革和建设都只能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这种客观形势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胡适的思想主张，除了纯粹的学术内容以外，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和平地改革，和平地建设。当然，他的改革和建设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模式，这同我们今天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有不同。但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知识和经验的层次上，美国的也好，欧洲国家的也



好，任何发达国家的优秀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借鉴。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作为中国人的胡适，他的思想、主张、学识和经验，何以不能参考借鉴呢？今天，人们对胡适的著作、胡适的思想，所以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实则，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正是我们这些研究胡适的人，不避嫌疑，撇开成见，努力探究胡适思想的真实内容和实际意义的最大动机。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所得，胡适的言论著作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加以思考、加以借鉴的。

（一）充分理性地面对一切挑战。

他要求人们充分运用自己和前人的知识、经验，进行合乎逻辑的思考，弄清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找出解决问题、战胜困难的方法，决不可任凭感情的冲动。任何个人的热情，或群体的热情（群众运动），若没有成熟的理性指导，必难持久，必难有成。理性是我们人类真正的优势所在，是我们获得进步、获得发展的真正凭借。所以，无论在顺利的时候，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决不可任凭感情蒙蔽我们的理性。这在和平改革和建设的年代，是极端重要的。

（二）提倡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改革，反对“目的热，方法盲”。

过去人们责备胡适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事实确是这样。但是，在和平改革的年代，在建设的年代，不可能用革命战争年代那套办法来解决问题。改革的事业，建设的事业，不可能有痛快的“根本解决”，只能循序渐进，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去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当年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时，李大钊并没有完全否定胡适的意见，他承认胡适的说法有合理的一面。如果完全拒绝对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寻找解决方法，不但改革和建设的事业难以有成，就是革命战争也无法取得胜利。提出一个美好的目标是很容易的，但解决通向这一目标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胡适始终告诫人们要关注眼前的具体问题，要从实验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把目标当作事实，不要醉心于口号和主义，而要把最大的注意力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见解，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在今天这个改革和建设的年代，人们只要不被偏见所蒙蔽，必然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



（三）反对武断迷信，提倡独立思考。

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珍视和发扬。但不容否认，也确实有一些不好的遗传，有待我们去克服。例如，科学思想、逻辑思想欠发达，有权发号施令的人容易武断，而无权无勇的小民则易于迷信，迷信古人，迷信教条，迷信权威。武断就不尊重事实，不研究事实，专己恃强，滥唱高调，以想象代替事实，随意下决心，随意盲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往往还不肯虚心总结教训，而是怨天尤人，下一次还要故技重演。不用说人们也知道，在现代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中，这种思想方法和作风是绝对要不得的。必须提倡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随时注意观察事实、研究事实，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不随意下决心，不热衷于唱高调，时时力戒武断和迷信的思想弊病。

如果说武断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色彩，那么迷信则是太无主观、太无独立意志的表现。在中国有长期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造成这样两极的现象是并不奇怪的。胡适一生都坚持反对这种两极的不健全的思想倾向，反对对名词、口号的迷信，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不信任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健全的思想习惯的养成，对于从事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四）以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

差不多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伴随着列强侵略而来，大多数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都难以摆脱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困惑。胡适本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初到美国时，他还是一个对西方文化怀有强烈戒心的人。但寝馈久之，他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第一，他明白地承认西方文化的长处；第二，他相信，不同质的文化是可以互相融通的，因为人类的文化在本质上是具有同一性的。他在二三十年代极力提倡以一种开放而自信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首先，要开放，要虚心迎接优秀的世界文化。其次，要相信两种文化长期接触、融通之后，本民族的优秀的东西决不会消失，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会产生一种适合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新文化。可惜，胡适生前死后，他的中西文化观常常被误解，被说成是所谓否定传统、不要祖宗的“全盘西化”。为了和这种所谓“全盘西化”针锋相对，不少的人，动辄拿祖宗的文明来炫耀、来安慰自己。当遇到民族危难和任何阻挡进路的困难问题发生时，他们就躲

在祖宗的神龛后面，指望祖先显灵去降妖捉怪，替他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当然，胡适的见解并非都十分正确、无可挑剔。他在批评传统文化、批评国粹主义的时候，颇讲过一些过激的错误的话，这正是一些并非顽固保守的人也不赞成他的意见的原因之一。但从总体上说，相对于那些迷信祖宗、迷信古董的人来说，胡适的文化心态毕竟是开明的。他一生都在努力沟通中西文化，希望新一代的中国人，在总结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的新文化，理当比他们的前辈更高明一些。我认为，人们只要撇开先入的成见，在胡适那里，肯定可以得到一些处理今天的文化冲突时可以借鉴的东西。

（五）中国百业待兴，应以树人为本。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改革和建设千头万绪，究竟什么是根本？胡适早在留学时期就认识到，中国应以树人为本，以教育为本。他归国时，打定主意要在思想文艺方面为国家建立一个改革的基础。这正是从树人为本的观念出发的。胡适一生主要服务于教育事业，所以，他的心思精力绝大部分也是用于教育，用于树人。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所谓独立，就是通过扶持若干个重点的大学和科学学术机构，培养出一大批世界水平的人才，使国家在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可以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使国家现代化具备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胡适所坚持的在现代化事业中应以教育为本、以树人为本的观念，并非是他个人的独创，实则是世界上一切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

（六）关于青年人的使命。

青年决定着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所以世界上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特别关注青年。从历史发展的观念出发，青年人最大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继承和掌握前人的知识遗产，训练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以便推进国家民族的进步。自然，各个国家、民族在发展进程中会遇到各种特殊的情况。有时，当遇到危机的时刻，也许需要青年人担当起特别的责任，甚至需要他们做出生命的牺牲。但即使是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青年人也仍然以学习和训练自己为最基本的责任。因为革命和战争同样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胡适生前对青年人发表过无数次讲演，他总是强调青年人的基本使命就是学习和训练自己，掌握一些真正的本领和技能，使自己成为国家社会



的有用之才，将来才有报国的机会。当年，他的言论颇受到一些革命青年的反对。他们认为胡适是拉青年人的后腿，不让他们投入革命。但今天我们是处在改革和建设的时代，重温胡适先生当年苦口婆心忠告青年认清自己的基本使命的话，就有不同的意义了。

（七）关于个性主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启蒙思想家可以举出许多人，但我觉得可以三个人为代表：一个是严复，他把进化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人，使人们明白世界进化大势，明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从而投袂奋起。另一个是梁启超，他要人明白，要建立新的国家，必须从“新民”做起，有了新的国民，才能有新的国家。第三个人，就是胡适，他叫人明白，自由平等的国家决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设起来的。要争国家民族的自由，必先争个人的自由；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民族的自由。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基点是要确立个性主义。每个人都应认识到自己是堂堂的一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有应尽的责任和应享的权利，有自己应做的事业。一个人要想有益于社会，必先把自己铸造成器。这些思想，过去通通被误解成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现在，人们的头脑比过去清楚得多了。如今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几乎人人都喜欢说一句话：“努力实现个人的价值！”他们应该懂得，个性主义，亦即“健全的个人主义”，其真意义正是在努力服务于社会的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胡适当年已意识到人们可能曲解个性主义，所以他提出“社会的不朽论”，让人们了解：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永久价值的人，唯一的办法是确立服务社会的观念，为社会人群谋利益，在促进社会的无穷发展中实现个人生命的真价值。

胡适言论著作中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并不止于上述这些。但对以上所举各点，如果我们能够屏除成见，认真研究，加以借鉴，当可获益匪浅了。

胡适已经去世 30 多年了，这 30 多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人们往往对离自己切近的人或事不易认识得清楚。迨时过境迁，隔了一个时代，人们回头去重新研究前人的思想行为，反而比他的同时代人认识得更客观、更正确。对那些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奋斗过来的人，尤其是如此。胡适在世时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死

后争议仍未停息。但对于大多数用了工夫去研究过他的人，只要不固执偏见，毕竟在许多基本的方面已接近于取得共识了。

对胡适认识的改变和深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反映出开放社会条件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做胡适研究的人，都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也正因此，我相信这项工作一定会继续取得进步。

作者

1995 年



重新发现胡适
(代序)

目 录

重新发现胡适（代序）	1
胡适与《新青年》	1
胡适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	19
胡适的文化心态形成的背景及其特点	34
胡适整理国故平议	50
“社会的不朽论” ——中西合璧的价值观	66
胡适与国语运动	73
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	80
胡适与抗战	91
胡适与陈独秀	107
胡适与蔡元培	132
胡适与梅光迪 ——从他们的争论看文学革命的时代意义	152
胡适与所谓北大南迁的问题	176
胡适与补选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风波	179
胡适的两首情诗	181
附录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185
附录二 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丰富宝藏 ——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	207
附录三 周明之著《胡适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中译本序	224
附录四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序	226
附录五 潘平编《胡适说禅》序	231

附录六 胡晓著《胡适思想研究》序	235
附录七 季维龙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序	238
后 记	240
再版后记	243



胡适与《新青年》

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杂志，胡适应邀题词。他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除了一部分反对和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人以外，大约中国知识界都会基本同意胡适的这种估计。

—

《新青年》原名《青年》，是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的。是年10月6日，胡适的同乡朋友，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原名炼，以字行）即将《青年》的第1号寄给胡适，并写信转达陈独秀邀稿之意。12月13日，汪续寄《青年》第2、3号并再致信说：“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务求拨冗为之……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陈独秀盼望胡适写稿是多么恳切。在朋友再三催促下，大约在1916年的夏天，胡适把一篇翻译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于第2卷第1号，亦即改名《新青年》后的第1号上发表了。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之始。此后于第2卷第2号有《通信》一篇，第2卷第4号起连载《藏晖室札记》。第2卷第5号，发表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从此开始，新文化运动也从此真正形成全国性的运动。《新青年》也从此更加受到知识界的关注。胡适，一个远在美国的留学生，竟然成了国内思想界、文学界的知名人物。他在《新青年》同人中的地位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



的地位，都因此奠定了基础。

1917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随将《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他向蔡元培推荐胡适，蔡亦很赏识“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胡适的学问与胆识。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9月便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18年，《新青年》从第4卷起由同人轮流编辑。主要编辑人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刘复等。在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还明确载明该卷各期的编辑人姓名。其他的经常撰稿人还有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等等。

《新青年》的编辑同人和在北京的主要撰稿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自由结合的小团体。由陈独秀首倡的个性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与世界化的基本精神，成了他们共同的信条。由此发生出来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伦理革命，都已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后来，人们将它概括地称为新文化运动。由于《新青年》同人绝大部分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或在北京大学兼任教职，所以，在外间看来，北京大学是引起这场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一派新教授们应当对这一运动负完全的责任。

到1919年春天的时候，《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以及北大的种种改革，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

旧文化营垒中有林纾公开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指责北大新派教授们“覆孔孟、铲伦常”，“行用土语为文字”，大失学府应有的风范。要蔡元培“留意守常为是”，不可鼓励新思想。

然而这还只是“台面上”的。与此同时，“台面”底下，林纾却化名写影射小说，用极苛毒的语言咒骂陈独秀、胡适，甚至还有蔡元培。社会上的旧势力更加不择手段，攻击陈独秀的匿名传单满街飞，咒骂恐吓的匿名信寄到胡适家里。小报、传单，甚至大报的新闻栏公然登载谣言，说北京政府要惩办北大教授，北大不得不辞退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已把他们驱逐出京云云。

还应指出，在北京的外国教会势力，也曾一度加入这一反对新文化的合唱，他们说，陈独秀、胡适他们正在鼓吹一种危险的“三无主义”，即“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

陈独秀、胡适、《新青年》、北京大学，使旧世界震动了。

胡适对于《新青年》的特别贡献，自然首推文学革命。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引起学界、知识界很大注意。陈深知此文的意义重大，故于《新青年》的下一期（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意思用更急进的语言加以概括。其文明白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此后有关文学革命的热烈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胡适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胡适被当时的人看做无可争议的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主要领袖。但这一事实却曾被一些人加以歪曲或抹杀。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说，文学革命不自胡适始，早于清末即已开始，其标志是白话报刊的盛行。另一种是说，胡适只主张文学形式、文学体裁的革命，而忽视内容的革命，因而，说他要使文学革命引入歧途。这两种片面、牵强、违背事实的说法，我早在16年前即1979年所写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两文中已有详细的驳论，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新青年》杂志当时实为领导文学革命的中心阵地。在该刊上的讨论涉及了文学革命的一切重大的基本问题。而胡适作为这场革命的倡导者，始终居于领导的中心位置。这可从几方面来看：

一、胡适的几篇论述文学革命的文章，都起了纲领性的作用。如《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要问题，引发全国性的讨论。这是尽人皆知的了，无须再谈。另有几篇大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①，这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傅斯年在《新青年》4卷1号上所发的《文学革命申义》，其中的一个重点即申述文学历史上新陈代谢的道理，正是胡适这篇文章中心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②，概述了他的建设新文学的纲领。此文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③。文章所提“国语的文

① 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② 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

③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4页。